

北京的洋沙龍

白杰明

一種官方以外的國際文化交流，一種「新時期」的「租界文化」現象。北京的「老外」，每每邀集中外人士共聚，乃成了「洋沙龍」。參加洋沙龍的中國人，第一代愛論政，第二代愛趕時髦。「老外」搞洋沙龍，既可找樂子，還是特殊的「中國體驗」。

北京的夜間生活貧乏得出奇。常住北京的外籍人士，在百無聊賴之餘，也想到尋找樂子的必要。雲集北京的「老外」（時興的對外國人的稱呼），堪稱龍蛇混雜，幹什麼的都有。在他們安排的樂子裏面，比較值得玩味的倒有一樣，那便是「洋沙龍」。平時，到了週末，尤其在週六晚上，住在北京的「法定租界」建國門外、齊家園或三里屯外交公寓的「老外」，會組織一伙中外人士到家中吵翻兒。本來，週末開開 party，玩鬧一通，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我所說的「洋沙龍」卻是別具一格的玩意，尋且成爲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第一代：文革的遺裔

洋沙龍同古今中外的文化沙龍有個共性：一羣自命不凡的、以文人騷客爲骨幹的活寶，羣而聚之，進行交際。他們似乎都有點「當今英雄人物非咱們莫屬」的信念。人數多了，自然也會出現各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場面。

北京的洋沙龍歷史並不長久，細算的話也還不

到十個年頭。在文革結束後，防止中國人和外國人接觸的清規戒律逐漸被另一套伸縮性很強的緊箍咒所代替。中外人士可以有有限度的非正式接觸。早期的沙龍自發地形成了。渴求同本地人結識的常住北京的外國人（有記者、外交官和學者）在一九七八、七九年「北京之春」前後，終於有機會遇上和他們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語言的中國人。那些人裏面有社會活動份子、畫家、作家（主要是詩人）和希望趁機練習外文的外國散人員。這就形成了北京第一代的洋沙龍。

經過數年波折，到了一九八三、八四年的「清污」運動時期，參與首批洋沙龍的中國人基本上各自有了「歸宿」：一些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改革的人被投獄；藝術家（主要是「星星畫展」的成員）有的結洋婚遷居異邦，有的獨自遠走他鄉；要筆桿的文人騷客則發跡較緩慢，直到有人譯介他們的作品到國外時，才有可能得到超渡。

第一代洋沙龍的華人成員多在三十至四十歲之間，在中國算是年輕的了。他們主要屬於「垮掉的一

代」的紅衛兵，頗能掌握政治、社會和自我三者之間的關係。當時和他們過從的外國人也有相當一部份是熱心於中國政治的人，彼此共同興趣和語言甚多，甚至還可以說有不少共同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第二代：講求實際

到了一九八五、八六兩年的「寬容」時期，北京出現了第二代洋沙龍。表面看，第二代洋沙龍有如第一代那樣多樣化，但仔細觀察則可以發現這時參加洋沙龍的中國人已是截然不同的代了。

第二代參加沙龍的人平均年齡在二十五至三十歲左右，身份仍舊以畫家、詩人和習外語的為主。他們同第一代最顯著的差別在於關心國事、談話政治的興趣大大地減弱了。這些年輕人和同代的駐京外國人一樣比較講求實際，他們關心個人前途，希望組織關係網絡，追求娛樂。對比之下，第一代入總愛裝出深刻狀，大談匹夫之責；第二代卻精通於時裝，趕時髦，以及全方位地介入國際青年的世界。他們和外國人聚會，不像上一代那樣經常談大道理，而是少談主義，多談實際。

這批年輕中國人當中有許多可供玩味的事跡。有的每次參加晚會時，總是捧着自己的近作，抓緊機會出示給老外們欣賞。若是作家，掏出來的便是手稿或鉛字的小說和詩詞（近來這類「地下讀物」有不少用電腦排字，有的甚至是英漢對照的）。畫家不能捧着大作跑沙龍，但他們也有絕招兒：出示全部作品的幻燈片。其他狂誕且可愛的例子更是罄竹難書。

沙龍主人的兩個類型

給第二代跑沙龍的人提供活動場所的外國人與

第一代也有一些變化。其中大部份人是文革以後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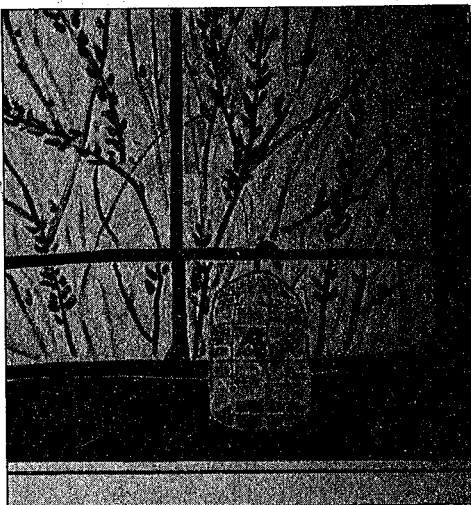
自己所發現的藝術家、詩人犧牲時間和精力，爲之

聲通過洋沙龍出口，倘若在外國成了名，說不定還能「出口轉內銷」，在當道者眼裏成爲可以爭取和

第一代也有一些變化。其中大部份人是文革以後才開始接觸中國大陸，甚至是在八十年代以後才來到中國。他們和大陸的年輕人一樣，對當代中國歷史和政治瞭解都不十分深入。

洋沙龍主人較特殊的有兩類：

一、發現者，亦叫「洋伯樂」。這一類人一般都會講點中文，酷愛中國文化。由於他（她）們的身份（記者、外交官或其家眷、商人、學者，以及外籍專家），有創辦沙龍的充份物質條件：寬敞的住所、可觀的收入、汽車以及外國關係。一個發現型的沙龍主人往往認為自己愛「才」如命，甘願為



▲違禁品？「星星畫會」作品，左為李爽的畫（局部），右為王克平的木雕。

自己所發現的藝術家、詩人犧牲時間和精力，為之鋪平走向世界的道路。他們同時也通過發現去肯定自己，並以藝術家的發現者的姿態成為沙龍活動中的主要角色。他們除了要有敏銳的發現能力，往往還有稱霸的念頭。為此，洋沙龍的主持人之間，彼此時有攻訐。

二、佔有者。這一類人到了中國，覺得除了昏昏然過日子，也理應享受一點「中國體驗」(China experience)。所謂「中國體驗」，有精神和物質兩種：精神方面包括認識一批中國人，物質方面就非得去購買一些中國玩意。北京年輕畫家的作品是理想的紀念品，既算得上比較新潮，價錢也不會太貴，而且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就是中共官方不時禁止這些畫家搞展覽，買一幅插上「違禁品」標籤的美術品，頗有冒險主義的誘惑。

佔有者是發現者的最佳同盟，他們經常合伙在外國人公寓組織一些被發現的畫家的展銷會，為藝術家牟利。倘若展銷生意興旺，洋東道臉面也會增加光彩。而且官方可能禁止的活動仍為特殊的觀眾舉辦，參加者無不感覺到幾分類似「閉門讀禁書」的喜悅。

此外，當然還有些是愛玩鬧的人，這些人都有幾分僥倖不羈，因為嫌北京的生活太枯燥無味，一旦風聞有熱鬧可湊便奮不顧身，踴躍參加。上述幾種人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變幻莫測，無法仔細剖析。

新時期的租界文化

在北京，洋沙龍的參與者人數很有限，但卻有一種與這微小的數字不大相稱的影響。這是官方許可和支配之外的國際文化交流；有些人的作品和名

聲通過洋沙龍出口，倘若在外國成了名，說不定還能「出口轉內銷」，在當道者眼裏成為可以爭取和團結的對象。

中國地大人多，能在十億芸芸眾生中有幸參加洋沙龍並非易事，需要一點「緣份」才行。第一，他們必須住在北京或經常出差到北京。第二，他們之中不知何故相貌堂堂者比例很大。第三，他們多數生為男士。

洋沙龍可說是一種「新時期」的「租界文化」現象。早在半個世紀前，英國作家阿克頓(Harold Acton)寫了一部諷刺北平的洋人文化圈的小說，名叫Peonies and Ponies(芍藥與小馬)，裏面描寫了幾位被主持沙龍的太太們請來充當點綴的中國人。洋太太認為這些人可以代表中國的文化復興，而請他們喝茶吃蛋糕則足以表現自己體察和同情中國的國情。雖然事過境遷，但洋沙龍近年又在北京興起。

現在的洋沙龍這種文化現象，仍有待文人用文章或者小說作描繪。聽說北京有一些局外的評論家正留意這種「新時期」的文化現象及其影響與利弊。他們已經清晰地看到洋沙龍裏面有相當一部份人是文學和藝術的門外漢。這些人只是到了中國以後，由於因緣巧合，或對官方文化的逆反心理，才開始成為另一類型的文藝鑒賞家。

澳洲新任的駐北京文化參贊周思(Nicholas Jose)本身也是一個作家，他有一部新作(暫名為Crackers《炮》)，就是以沙龍文化的怪現狀為背景的。巴金的公子前年用李曉的筆名，發表了數篇畧有錢鍾書諷刺小說筆調的作品(如《繼續操練》和《機關軼事》)。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北京的作家羣裏面會有人試寫他們身邊的新「圍城」。